

雁过声犹在

石湾

大年初五,有几个朋友在我家聚会,手机多次响起信息的短铃声,我想肯定又都是友人发来的新春祝福,就未一一收看。直到晚间九点钟,将朋友们送出家门之后,才发现十余条手机短信中竟埋有一条噩耗:“诗人雷抒雁今晨去世!真会死,死在情人节,做鬼也风流!”

尽管我没觉得这一噩耗来得很突然,但心里还是希望它仅是误传,便立即给发这短信的朋友打电话,进行核实。对方说:“你今天没上网吧?网上已经有许多悼念他的微博了……”我不能不信了,随手就给我女儿打电话:“你雷叔叔今天一早走了……”话刚出口,一串热泪就流了下来。女儿听到了我的哭声,长叹一声,劝慰我说:“爸,你不是早有思想准备了吗?别太难过了。”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月九日她回家吃年夜饭时,在问到春节都有哪些朋友来家聚会时,我就告诉她,雷抒雁住院了,看来是凶多吉少……

春节前,作家出版社的老同事聚会,临散席时,张胜友才对我讲,听说雷抒雁住院了,想去看望他。回到家后,我对妻子说起此事。恰好那天她在楼下中国作协老干部活动中心见到了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张同吾,同吾兄告诉我,抒雁确实住院了,但谢绝朋友们去探望,因说话已很困难,医护人员连电话都不让抒雁接听听了……由此,我就担心他这次恐是出不了院了。年初二女儿回家来时,又问起抒雁,说:“记得我小时候,每年过春节,雷叔叔和你的

几个诗友总会到咱们家来聚会的。有一年寒假,他女儿还在咱们家住过好多天呢!”我说:“是啊,他与他是快四十年的朋友啦!”

我与抒雁相识于一九七四年十月,那年《解放军文艺》发表我的长诗《天安门颂》,李瑛让他亲自来的部队抽调上来,这一期刊物特辟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专栏,把你的诗排在首页,编辑部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定下来的,领导很重视哩!编辑部让我给你送样刊来,就是要我你这个新编辑多与作者交朋友,熟悉作者队伍……”我感动地说:“我从学习写诗以来,向报刊投稿不计其数,最初收到退稿时,总是只附一张冷冰冰的铅印退稿信,后来陆续发表过几十首诗,但也从不知责编是谁。这次是第一次给你们《解放军文艺》投稿,没想到稿寄出不久,就接到李瑛同志打来的电话,通知我稿将被采用,还客气地说:‘我给你改了几个字,样稿就不送来给你看了,行吧?’李瑛是我敬慕已久的著名诗人啊,这么热心地对待我这样一个年轻作者,真不知怎么感激才好!”抒雁说:“我们部队的诗歌作者,也大多数是读着李瑛的诗成长起来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有幸到他的手下当编辑。李瑛同志很勤

奋,从来不午休。我看见他好些诗都是在别人午休时写出来的。勤奋出天才。我到《解放军文艺》工作之后,在他的影响之下,也不再午休了……”

我比抒雁长一岁,由于都是“文革”前入校的大学毕业生,所以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当时我正借调在文化部艺术局编《战地新歌》和参与全国文艺调演的宣传工作,观摩文艺演出的机会比较多,凡是有富余票的时候,我都会约抒雁一起去看。尤其是内部组织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一些名目参考、实为批判的“过路片”,我也都尽可能地为他找一张入场券。在那“外来的资产阶级”“被彻底禁锢的年代,对于在军队从事诗歌编辑与创作的他说,这无疑是一件求之不得而又大开眼界的事情。待到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我俩见面时,对江青关于文艺工作的《纪要》及她宣扬的一套所谓“三突出”的创作理论,就多有异议了。记得在一九七五年不同寻常的七、八、九月间,我俩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碰一次面,互通“小道消息”,私下谈论江青的丑闻劣迹,密切关注国家的命运……因此我感到,在“四人帮”垮台后,他是文学界最早的觉醒者之一。进

入新时期,他联系的作者面也宽广了许多,记得艾青刚回到北京,尚临时安置在北纬饭店,他就约我一起去看望、请教。此外,我俩还一起去拜访过刘宾雁及从外地来京的公刘、周良沛、雁翼等复出的著名诗人。在《小草在歌唱》轰动全国之后,他在文朋诗友面前,也没有显出一丁点儿志得意满,依然亲和如初。最为难忘的是,有一年我俩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宝臣一起,骑自行车去踏寻荒野里的圆明园遗址,追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展望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

近四十年来,我与抒雁从未中断过交往。我在作家出版社主持《中国诗库》丛书的出版时,特意把《雷抒雁抒情诗百首》列为打头之作,这不只是出于我俩深厚的友情,更主要的是我坚持认为他是新时期中国诗坛成就斐然的杰出代表,一直冲锋在思想解放和艺术追求的最前沿。有意思的是,我俩是在中国作协同一天办的退休手续。几年前,还有幸与他一起应邀先后到陕西和贵州等地采过风。见他大病后思维依然清晰敏捷、谈吐依然机智风趣,我分外高兴。因此,去年中国诗歌学会换届之前,当得知他在复杂的背景下被确定为会长候选人时,我毅然推迟了原

定三月中旬返乡长住的行程,出席了终于在四月二十五日举行的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大会,为他当选会长庄重地投上了一票。

近些年在文学界的活动中见到抒雁时,他总问我有没有郭宝臣的消息。在诗歌学会换届大会上,他一见到我,又说:“要是宝臣也出席今天的会,老朋友能在这里聚会该有多好呀!”宝臣的女儿和我俩的女儿差不多年纪,儿时的三个小姑娘常在一起玩。未料后来宝臣的女儿刚入花样年华,就在洗澡时因煤气中毒而惨遭不幸,加上宝臣在退休前未能评上正高职称,接着又丧妻,所以情绪低落至极,不再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据说是隐居到了远郊的亲戚家。换届会圆满结束,我与抒雁告别时,他又说:“我从来不敢赞成文人相轻。诗歌界也宜聚不宜散。你再设法找找宝臣,有消息就告诉我,年轻时的诗友,还得要多聚聚啊!”

那次会后,曾与郭宝臣合作写过获奖报告文学《命运》的杨匡满答应我,由他来说法与宝臣取得联系,到时约上抒雁,一起来到老家居住的楼里相聚。初冬我从老家回京后,听作家出版社在任的同事说,抒雁正应在写《陆游传》。我相信,诗人写诗人,一定会写得很精彩。然而,没想到尚未完稿,他就匆匆走了。我想,他赶在情人节远行,未必是去见他心中的“唐婉”。但他确实是个很重情义的风流才子。此刻,耳际又传来他与我诀别时的嘱托:“年轻时的诗友,还得要多聚聚啊!”……

名家新作



农历正月十六,是大兴安岭下鄂温克民族奇特的闹春之日。这天,每个人都要抹黑脸;这天,大山里的春天开始了。

过了欢快的元宵节,鄂温克人就从春节的休闲中走出来,紧张有序地忙春了,真正踏上新一年的起点。而正月十六往脸上抹点黑,其意是他们在这一年里不怕鬼神不怕虎狼不怕风雨不怕一切。在鄂温克人的目光中,黑是深刻凝重的,是勤劳、勇敢、威猛的象征。

抹黑脸的这天,大兴安岭山山外依然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天刚一露亮,大红鼓就伴着冰河炸裂的脆音,一声又一声有节奏有花点地响起,咚咚,咚咚,咚咚……激越、热烈、酣畅,如生命的呐喊到处旋动。大红鼓敲响了对群山,敲出了漫天的朝霞,也敲热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小伙子戴上狍头皮帽子,穿长毛皮袍,取来锅盔灰或者墨汁,跑出传统的柳条墙,你追我赶,尽情地互相往脸上涂抹,好像抹得越多越黑才是最无畏最勇敢。老人们在谁都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给自己的脸上抹道黑杠,还笑咪咪地喝一口开春酒。然后像化妆一样给孩子们抹上好看的黑花纹,并且领着孩子们去登山,培养锻炼坚强无畏的品质。姑娘们的花头巾披来飘闪的彩云,她们一边滚冰一边互相抹黑脸,接着跳冰舞、唱情歌,吸引来小伙子的脚步。

太阳跃上大兴安岭顶峰时,有些人去古榆树下祭敖包神、熊神和山神,以表达虔诚对大自然的崇尚。更多的人相互串门,喝白酒吃肉干,问候与祝福,表现整个民族的团结和兴旺。既然什么都不怕,姑娘小伙子便无拘无束了,他们在冰雪之中狂热地欢跳,唱那支谁家都会唱的歌:富饶美丽的家乡,坐落在大兴安岭下,鄂温克是勇敢的鹰,我们什么都不怕……这回荡在大山里的歌声,滋润着节日和甜美的生活,也振奋着人们的精神。

村里最老的老人丹巴笑开了满脸的皱纹,他一路小跑登上了石台,对着蓝天白云吹了三声鹿哨。顷刻间,象征吉祥

和幸福的柳哨、草哨、狍哨、角哨、骨哨便在四面八方响起,这只属于森林的音乐此起彼伏,缭绕不绝,远远近近的大山都产生了回音。

晚霞贴上天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集合在玫瑰色的黄昏里,开始欢跳熊斗舞了。他们不分男女,俩人一组,上身向前倾斜,膝盖弯曲,两手放在膝盖上,双脚同时跳跃,肩头和头部左右互换方向,发出“吼莫、吼莫”的声音。鄂温克人认为其祖先可能与熊之间存在着一种血缘关系,所以崇拜熊的图腾,更喜欢熊不怕一切不顾一切的粗犷性格。他们尽情而疯狂地欢跳,不出汗决不退场,因为他们也把抹黑脸的这天当作熊的节日了。

这天,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到家里来,鄂温克人都热情接待,给酒喝,给肉吃,给你唱歌。据说“有火的屋子才有人进来,有枝的树上才有鸟落”这句古老的民谚就诞生在抹黑脸的这天。晚上,一窗窗灯火闪烁光亮,这大山里的民族还在欢聚与叙说,抒情寄志,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鄂温克人说,这夜的月亮最圆

心香一瓣

盼归的母亲

徐祯霞

记忆中,新年总是与母亲分不开的。

一进腊月,母亲的眼里便充满了期待和盼望。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手机和电话,母亲便托熟人将口信捎给我们每一个儿女,实在捎不到的,便让父亲给我们写信,让我们早早地回家过年,别忘了回家的班车。

于母亲来说,过年是我们家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不亚于我的哥哥娶亲和姐姐出嫁,因此,母亲将它看得很很很重,一年到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才能全部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无所顾虑也无所烦恼地度过一些时日。这样的日子于我们来说是难得的,放松的,也是最惬意开怀的,我们尽情地享受着母亲的关爱与呵护,享受着家的温馨与甜美,享受着人间的至爱与亲情,享受着最纯最美最令人珍惜的人间天伦之乐。

整个腊月,村口都有着母亲清瘦的身影,母亲站在村口的大石包旁边,翘首望着远处的道路,这是一条纵横于两个乡镇的道路,一条通向西川,一条通向中河,路上的车辆很多,过往的人也很多。母亲并不知道我们会在哪天归来,她就只有天天站到路口上去等待,每一个从远处走来的身影都是她眼中的盼望,当一个身影从远处一里外的拐弯处出现的时候,母亲的心里就充满了盼望,她在猜想,这个人会是谁?是男的,女的?会不会是她的儿子或者是女儿们其中的一个?那个身影从远远的地方走来了,近了,再近了,到能够看得清对方的体形与模样时,他或者是她却并不是母亲的孩子,母亲失望了,失望过后,母亲又再等待下一个身影的出现,当下一个身影出现的时候,母亲又如此前一般的盼望,当那个身影再次走近,却还不是,母亲在一次一次的失望之后,却又充满了希望,因为,她相信在某一天,在某一个时候,在远处走来的身

影里,总会有她的孩子,于是她就天天站在大路旁,伫立在寒风中,等待着她的孩子们归来。

母亲的头发常常被风吹起,吹得很乱很乱,母亲用手捋捋,仍然坚定地站在那里,风吹不走她等待孩子的信念,风也吹不动她坚韧的姿态,于是,长长的一个腊月,母亲就站立成一处风中的风景,没有口罩,没有手套,冷了,母亲就双手交叉,互相搓搓,搓搓手,待手有了温度,然后再用稍许温热的手去搓搓脸,实在冷得不行了,就将双手放在嘴边呵呵气,将冻得僵硬的手与脸陪呼出的热气来增加一点温度,母亲就这么一直站着,从早上站到中午,再从中午站到天黑,直到黄昏来临,天已黑尽,母亲才满心失望心有不甘地归去。那样的夜晚,纵然母亲坐在床上,心里也仍是在惦记着她的孩子们。

待到某一日,她终于等回了她的孩子们中的一个,母亲的兴奋与欢喜便溢于言表,当她的这个孩子在山脚边出现的时候,母亲就大喊着她的孩儿的乳名,三步两步抢上前去,接过孩子手里的东西,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够拿得动,就强撑着往回提,母亲踉跄的步履与沧桑憔悴的容颜常常让我们的眼里溢满了热泪。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已年近,而我尚未自立,母亲对我的担心与牵挂总不能释怀,我正行走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我的人生尚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彼时,母亲的臂弯是我唯一的家,过年了,纵然我在再远的地方,母亲都一定要唤我回来,于母亲来说,漂泊在外的孩子是不可以没有家的,也是不可以不回家的,因为母亲的爱才是我幸福安乐的家。

母亲的召唤总能让我内心安定,在过了一个快乐而又轻松的新年之后,我又整装待发,踏上新的路途。因为有母亲盼望的眼神,我走到哪里都不孤单,因为有母亲等待的身影,纵然走到天涯海角,也是不会遇上再黑的夜,也不会害怕寂寞与孤单,想到寒风中的母亲,我的心里总会涌起无边的温暖。

而今,母亲已经故去,但母亲翘首风中的身影永远都是我心灵永驻的家。



凭海临风



冬雪如蒙 朱文杰 摄

年后的山村

高若虹

有几个老人掀起棉布帘走出来
残留在墙角的炮竹红纸屑
疯了似的追着鞋底跑
兜着正月寒风的门帘缓缓落下
扇得门框上的春联起伏伏

有几眼窑洞的铁锁高挂
守着窑洞里的团圆、喜气、吉祥不让流失
风使劲地拍打着那把锁
可惜那么多被大红灯笼照亮的忙碌 笑声 话语
让关闭的锁孔说得很难 很冷

偶尔响起一声牛哞 两声羊咩 三声鸡啼
再偶尔从黄土路上传来几声苍老的咳嗽声
听着空荡荡的 把胸膛掏空似的
只有村口一棵老槐树一声不吭 寂寞地坐着
像举着一只网打捞那一年一度的时光

一双又提着蛇皮袋 拉着旅行箱的手
又拉着提着走了 如一股刮来刮去的风
只留下一串串针脚般的脚印
仿佛留下来的一只只耳朵 用来聆听

不走的是有些褪色的春联
像一列火车开远了的铁轨
留下那些字 黑黑的 坚持着 像一些人 一些窑洞
站得那么整齐 那么辛苦
害得一双双淌老泪的久欠欠地看着

奇缺,五毛钱一个的鸡蛋都买不着。家乡又逢大饥,我家里无以为我的女儿一家四口随后从美国飞抵北京,他是借女儿的光,免费在北京承德观光八天。

堂兄是我叔父的儿子,出生在越南西贡附近的一个小镇。一九五六年随着一批爱国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先在广州补习汉语,后考上北京某学院,毕业后留北京工作。“文革”中移居香港,已有四十余年。

那天,我亲自到北京西站接他,因为他是兄长,七十六岁之龄,大我两岁。我本想到站台里接他,但来自香港的列车不卖站台票。我在出口处接到了他,只见他一手拉着拉杆箱,一手提着旅行包,旧前进帽下的脸庞,明显比过去瘦了。历经生活风雨的磨砺,洗去了许多往日的活力,比我心目中的他显然老了。但刨去我预想的成分,他还是显得很结实,落差没有大让我吃惊。让我意外的是他的衣着和拉杆箱,都是相当陈旧之物,朴素得不能再朴素,没有常见的港客派头。我要接过旅行包,他不让,说“这沉,你拉拉杆箱!”我领着他走向出租车站。他说“不打”的’,坐公交车就行!”我当然按我的计划行事,打“的”把他送到旅行社约定的酒店。

堂兄曾有恩于我,我始终铭记于心,多少年来未敢忘怀。一九五九年,我艰难地读完高中课程,并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但我的大学之路不平坦,三年级还没读完,竟得了肺结核,于是住院、休学。好在医疗费用都由国家全包,助学金也让我伙食无虞。但此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匮乏,营养

堂兄的性格忠厚老实,为人处事,谨言慎行,与世无争。他深知自己的身份,遇事躲着走,不招灾不惹祸,不损害他人利益,与同事相处得很融洽。他的孤独感,是“文革”形势所造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海外关系”被视为洪水猛兽。满怀爱国热忱回国读书的侨胞子弟,忽然成了怀疑对象,总被认为有里通外国之嫌。愚人愚己的观念,伤害了多少爱国者。后来谈及此事,堂兄只是感到很无奈。

往事不堪回首。旅行社安排的活动结束之后,堂兄独自在北京逗留三天,要和在京的大学同学聚

港客

郑荣来

留三天,要和在京的大学同学聚会。也是一呼百应,在京同学都应邀赴会。他备足了现金,想真诚款待久违的好友,也展示一下“港客”的大方,但谁都不让他抢先。大家回忆往事,都感念他当年的慷慨,不时掏钱请客打牙祭。席间还分发了好友们事先制作的一个光盘,它记录了他们当年的许多生活瞬间。其中的不少镜头,作者竟是我堂兄,当时只有他有相机!

在短促的三天里,我们见缝插针,利用所有相聚时间尽情叙旧,畅谈别后种种。他原在香港一家企业当技术员,十多年前退休。他领取香港政府的退休养老金并不高,每月二千元。虽然生活基本有保障,但过得比较清

苦。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租住朋友的旧房。他说他经常到深圳,购买蔬菜瓜果,这些都比香港便宜。刨去往返车费,仍然很合算。买几根苦瓜,一斤肉馅,外加一兜蔬菜,够吃好几天。

原来如此。“港客”堂兄,其实是个穷人,名副其实的穷人。按香港的标准,月收入四千港元以下者,都算贫困户,而去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每六个港人中有一个是穷人,每三个港人中则有一个是穷人。毫无疑问,堂兄位列其中。

现在我理解了:生活中他一切很节俭,能坐公交,绝不打“的”,此次来京,也不愿乘飞机,而选择坐火车……这些固然是他节俭的一贯作风,但想必也确有手头拮据的因素在。

然而,他对别人却很大方,而且处处为他人着想,不让别人为他多花钱。平时,我们通电话,总是他主动打来,而我给他电话,他一接到就让我挂掉,他马上回挂给我。他说我给他挂长途,比他往内地打费得多!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排忧解难,是他的行事风格。

那天坐地铁,他面前有位十七八岁的女孩,一手够着头顶上的栏杆,先是心事重重,接着默默流泪,泪水滴到地上,我们看得真切。堂兄关切片刻,对她说:“别难过,有什么事想开点。”说着,从衣兜里取出一沓纸巾,递给了那女孩。女孩接过纸巾,但没有立时擦拭,还是让眼泪流淌着。过了两站地,女孩下车了。那一刻,我心里解读着堂兄刚才的那个细

节:这是一位老人的道德情怀?见不得他人的伤心情况;这是一位港客的自然行为?久居香港养成的一种文明……不论是什么,有一点似可肯定,他想必是在体察女孩此刻心中的纠结。

这次来京,他还有一些愿望:想登临天安门城楼,想看看南锣鼓巷他岳父故居的旧址,我都陪他前行了。计划外的一个项目,是我的临时安排,到鼓楼“姚记炒肝店”吃炒肝。美国副总统拜登曾光临此店。我们慕名前往,也是排长队等候,但该物不如报上所说,也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的:肝不是炒的,而是不稀不干的糊状物,并且九元一碗,竟未见丁点儿猪肝,肥肠也只有两小段。事后方知,我们当时的感觉,其实是“老冒儿”!但有此体验,堂兄还挺满意,他宽容生意人的疏忽,说生意好了不讲究也是常有。

故地重游,堂兄多有感慨:“四十多年,变化太大了!”他久居香港,观念早已融入香港主流社会。港客中也是形形色色,而他是富有个性的“这一个”。他对中国有很强的认同感,国家的强大,也深感自豪。谈及时政和世界大事,我们颇多共识,推心置腹,少有歧见。为此,我有时把他看作堂兄,有时又把他视为爱国港客。堂兄,港客,两个形象,不时在我面前交叉显现。

那天,我送他到西站。此车的站台票依旧不卖。站在入口检票处,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我仿佛读到一个字——善。堂兄,一位普通的香港客,一位朴实的善良人!

朝花夕拾